

裴度、元稹矛盾对中唐文学的影响

杜学霞

(郑州师范学院 中原文化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裴度、元稹交恶是中唐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二人由关系相对融洽到关系恶化再到长庆期间矛盾公开化,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唐错综复杂矛盾的一个交织点。个人恩怨是矛盾的起点,其背后由于各自所属利益集团不同而导致的政治见解的差别是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其中,裴度与元稹所代表的翰林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以裴度为代表的主张削藩的力量与以皇帝为代表的“妥协派”之间的矛盾以及以裴度作为资深政治家与元稹所代表的文士之间的矛盾,是矛盾的焦点。裴度与元稹的矛盾对中唐文学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个人恩怨;翰林学士;削藩;资深政治家;文士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14)01-0099-06

一、裴度、元稹的个人恩怨

裴度、元稹交往始于元和初期。论年辈,裴度应是元稹的前辈,二人的出身和经历则有许多相同之处,政治见解也颇相同。如都出身中下级官员家庭,都是由科举踏上仕途(裴度进士出身、元稹明经出身),都曾应制举并以对策高等获得清要职务。二人早年政治经历也基本上相同:元和元年九月,时任左拾遗的元稹“因屡次上书言事,为执政所恶,出为河南尉。”^{[1]56}就在同一年,时任监察御史的裴度也因为“密疏论权幸,语切忤旨,出为河南府功曹。”^{[2]4413}按照唐朝重京官、轻外任的习惯,两人分司东台实际上都是遭到了贬谪。去洛阳的路上,二人同行,应该有相惜之情。元和四年,元稹任监察御史,与裴度成为同事。在政治见解上,他们对待权贵、对待宦官都表现出刚直不阿的态度,也都因此受到过打击;元稹刚任拾遗时向唐宪宗献《教本书》《谏职》《论事》等表,为裴度所赞赏,认为“所言当行”。

元和后期,二人的政治地位和身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元和五年元稹在东台(洛阳)不满一年,便弹奏权贵和宦官数十事,受到权贵和宦官的报复。后在返回西京长安途中,宿于敷水驿,又发生了与宦官仇士良争厅事件。在此事件中,元稹遭到宦官殴打,宪宗包庇宦官,反而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参军。此后十余年,元稹一直在贬谪地,位沉下僚,直到元和十年才被量移为唐州长史,随即又被出为通州司马。这一时期他虽与白居易写诗唱和,在文坛上声名远播,仕途上却处于低谷阶段,用元稹自己的话,这是“废滞潦倒”“备极恹惶”的 10 年^{[3]353}。相比之下,裴度在朝廷里的政治地位和名望却大大提高。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方镇的刺客刺杀后,唐宪宗提拔力主削藩的裴度为宰相,把削藩的重任交给了他。在朝廷削藩遇到困难时,又主动请纒到淮西平叛并于元和十二年平定了叛乱。由于此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央的威望,裴度被晋封为晋国公。

也正是元和十二年朝廷削藩成功,元稹的政治

收稿日期:2013-10-21

作者简介:杜学霞(1965-),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师范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唐代诗学和中原文化研究。

命运出现了转机。朝廷为了庆祝削藩成功,准许被贬的官员量移。为了重新获得被重用的机会,元稹以《上门下裴相公书》乞援于裴度。该书言辞恳切,不仅提到了他们的私人情谊,还提到了他们当年提拔他们的裴垪,希望吸引的心理十分明显。但根据现有资料看,元稹并没有得到裴度的帮助,倒是他原来的御史台上司、时任宰相的李夷简出手相援,元稹才得以量移虢州长史。元稹是否会因此事对裴度心存芥蒂?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至于裴度如何未对元稹予以帮助,理由可能有:以当时裴度的地位,向他求援的一定不少,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也可能是在裴度的眼里,二人的交情并不算深;或许是,元稹虽然在文坛上居于盟主地位,但其文学观念与白居易的诗一样同属于“下偶俗好”,不被提倡“雅正”文学观的裴度认可。更有可能的是,裴度出身“河东裴”这样的高门大姓,未必能看得起元稹这样的寒门士人。

但量移后,元稹的仕途出人意外的顺利起来。元和十四年(819年)冬,元稹返回朝廷,迁膳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820年)2月,迁祠部员外、试知制诰。5月迁祠部郎中、知制诰,赐绯鱼袋。长庆元年(821年)2月,更是“一日之中,三家新命”: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长庆二年(822年)2月,同平章事(拜相)。不到两年时间,元稹从一个七品小官实现了文人梦寐以求的宰相梦,连元稹自己在给穆宗的上书中也认为是“不顾班资,近日宠荣,无臣此例。”^{[3]405}考察其升迁原因,主要包括:一是有时任宰相的段文昌等提拔推荐;二是按照史书上所谓的结交宦官,侥幸得位。(关于元稹结交宦官侥幸得位的事,笔者认同周相录的观点,认为此事可以存疑。见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三是个人才华为穆宗欣赏,政治观点也与穆宗有一致之处。但其升迁途径既非正常,也就颇遭非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有关于元稹超常升迁人望不伏的记载。如其任祠部郎中,知制诰时“然其进非公议,为士类訾薄。”^{[4]5228}及入相,更是“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2]4334}揣摩此时裴度的心理,可以想见,作为一个靠个人实力登上高位的政治家,也未必肯将一个“无大功可据,立朝又不久的小臣”放在眼里^{[1]292}。

长庆元年朝廷里发生的科举考试案,也有可能

造成裴度与元稹的个人矛盾。此次考试由礼部侍郎钱徽主持,其所录取的进士,大多是官宦子弟,其中就有裴度的儿子。宰相段文昌和翰林学士李绅向穆宗提出选士不公,穆宗征求元稹的意见,元稹站在了段、李二人的立场上。后来皇帝命人复试,裴度之子落选,对元勋裴度很没面子,所以裴度很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对元稹产生看法。

从元稹这方面说,无论从威望还是实力,当然没资格也不敢公开与裴度抗衡。但按照其自身性格和返朝后春风得意的心理,开始不把裴度放在眼里是情理之中的事。按照《旧唐书》说,元稹有着“性锋锐,见事风生”的锐利性格,这种性格在元和初期任左拾遗和监察御史时就有所表现^{[2]4327}。这样的性格,从好的方面看是刚直不阿,敢于碰硬,其另一面则是过于锋芒毕露,给人急于进取,沽名钓誉之嫌。所以,撇开元稹对裴度未能吸引的旧怨不谈,由于翰林承旨学士在中唐的入相的几率极高,任翰林承旨学士后,抱着急于进取心理的元稹将有望再度入相的裴度看成竞争对手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史书上说“稹无怨于裴度,但以度先达重望,恐其复有功大用,妨己进取,故度所奏画军事,多与弘简(宦官名)沮坏之”,裴度和元稹的关系就此紧张并开始公开化^{[2]4423}。

二、裴度、元稹长庆时期矛盾主要焦点

元稹和裴度关系恶化,除了个人恩怨外,主要还是政治见解等的不同。其中,对待翰林学士政治力量的态度,对待朝廷削藩问题上的不同主张是二人矛盾的焦点,这两个问题往往又是交织在一起的。

(一)裴度和元稹分别与翰林学士的关系

有研究者指出,“中唐以后中央核心决策集团在宰相系统之外又形成了两个系统——即宦官系统(其首脑为神策中尉和枢密使)和翰林学士系统。”^[5]中唐以后翰林学士的出现,既是为了适应唐代后期社会经济越来越复杂的形势的需要,也是皇帝为了加强个人权利而设置的专门为自己起草诏书的机构以分割相权所致。德宗、顺宗、宪宗以来,翰林学士在中唐的政治中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虽然不能像宰相那样直接拥有对朝政的决策权,但却因为靠近最高权力中心皇帝,对朝廷的各项大的举措

有着一定的影响。德宗时期,翰林学士作为皇帝私人秘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势力。翰林学士陆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为德宗出谋划策,因而有“内相”之称。顺宗时期,在顺宗中风没有执政能力、宦官内部发生分歧的情况下,翰林学士郑絪不请自书“立嫡以长”,主张立广陵王(即后来的唐宪宗)为太子,对稳定朝廷政治发挥了很大作用。宪宗时期,翰林学士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不少人出翰林学士院之后,先后荣升宰相。因此,中唐翰林学士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有时堪与宰相抗衡的政治力量。

裴度与元稹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索是长庆元年的削藩。长庆元年7月,幽州军人朱克融背叛朝廷,囚禁了朝廷派来的节度使张弘靖。半个月后,镇州武将王庭凑杀害忠于朝廷的镇州节度使田弘正,自称留后,背叛朝廷。8月,朝廷派裴度、田布等数路大军共计15万兵力讨伐,不但未能剪除元凶,叛军反而把牛元翼带领的官军围困在深州。裴度把官军失利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翰林学士与宦官的从中干扰上,于是向穆宗三上章,“论翰林学士元稹与中官知枢密魏弘简交通,倾乱朝廷。”^{[2]492}至此,裴度与元稹的矛盾公开化。穆宗不愿得罪拥有兵权的大臣,为了顾大局,不得已罢元稹的翰林学士,出为工部侍郎。

裴度对元稹的指责是否客观公正呢?这是个史学家和文学家聚讼不已的话题。正史一般强调错误在元稹一边。如《旧唐书》中说:“时翰林学士元稹,交结内官,求为宰相,与知枢密魏弘简为刎颈之交。稹虽与裴度无憾,然颇忌前达加于己上。度方用兵山东,每处置军事,有所奏论,多为稹辈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宠荧惑上听。”《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也多取了类似的观点。但据笔者研究,元稹在这场政治事件中被当成众矢之的,其所扮演即便不是替罪羊的角色,至少也是有代人受过,且无法辩解之委屈,因为这里面夹杂着穆宗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

考元稹是长庆元年2月进入翰林学士院。此一期固然深得穆宗信任,以致“每事咨访焉”,但对削藩这样的军国大事,元稹是没有胆量横加阻挠的。裴度他没有看到,朝廷战争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官军缺乏战斗力,几路大军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挥,给养未能跟上等都是重要原因。而将出师

不利的原因单纯归结为元稹等的阻挠,很难说没有夹杂着个人意气。他上书中指责元稹等“翰苑近臣,结为朋党”^[6],不仅涉及元稹和宦官,还把矛头指向了当时也在翰林学士院的李德裕和李绅,打击面也未免太广,更给人有官报私仇之嫌。二李虽与元稹个人关系较为密切,除了在长庆元年科考复试中剥了裴度的面子外,与裴度并没有实质矛盾。但如果按照中华书局1975年版的《旧唐书》中裴度给穆宗的上书中提到的“翰苑旧臣,结为朋党”,虽然“近”和“旧”只是一字之差,裴度的矛头则完全可能是指向了元稹为代表的元和朝和长庆朝翰林学士政治势力。据考,翰林学士力量在元和后期和长庆时期,在对待藩镇问题上大多是持妥协态度的。按照毛蕾博士的统计,元和后期到长庆元年在翰林学士院先后供职且主张罢兵的有:钱徽、令狐楚、王涯、萧俛、段文昌、杜元颖、元稹、李绅等,这些人中大部分人在穆宗朝都先后入相,成为反对朝廷对藩镇用兵的主要力量^[7]。元稹入翰林学士院前后,都与翰林学士政治力量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理解只有一点说不通,即裴度上书时,那就是元稹正在翰林承旨学士任上,谈不上“旧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对藩镇用兵的问题上,裴度与翰林学士之间的矛盾并不自元稹任翰林学士始。裴度对元稹的指责,既包含着个人情绪,也包含了对整个翰林学士力量的不满。他给穆宗上疏中第二疏中说“弘简、元稹等实为朋党,实蔽圣聪,实是奸邪,实作威福,伏望议事定刑,以谢天下”,其言辞之激烈,对于一个老成持重的大臣而言,实属反常,说明他非常情绪化。对此,周相录的评价为:“疏多空言,颇类攻讦,裴毁元如是,兼及二李,不无可疑”,是有一定道理的^{[1]204}。考察一下从元和后期到长庆期间的翰林学士在朝廷对藩镇用兵问题上的态度,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长庆时期裴度对元稹的猛烈诋毁,实则是元和时期裴度与翰林学士之间旧怨的延续。因为在元和时期,翰林学士成员总体上在对待藩镇的问题上是持“姑息”态度的。当时朝廷在淮西用兵4年,战事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元和十一年,唐邓节度使高霞寓的军队为吴元济所败,高霞寓仅以身免,更是震惊朝野:“是日人情惊悚,宰相奏对,多请罢兵。”^{[4]456}如果不是宪宗在削藩问题上持坚决的态度,朝廷很可能会延续德宗

对藩镇的姑息态度。为取得削藩胜利,宪宗果断罢免了反对用兵的宰相李逢吉、韦贯之等,还罢免了主张休兵的翰林学士钱徽、令狐楚、萧俛、卫次公等。当时作为削藩的主帅,裴度与翰林学士之间的矛盾非常激烈。裴度与穆宗朝翰林学士矛盾的激化,某种程度上是裴度对元和时期翰林学士政治力量不满的延续。

从元稹这一方面看,不仅他本人身为翰林学士,其政治道路则始终与翰林学士政治势力有内在联系。其中,他与段文昌、李绅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段文昌与元稹既有姻亲关系(元稹的发妻韦丛之庶母段氏对韦丛有养育之恩,段文昌是段氏之娘家人),在政治上也是互相提携的。据元稹自述“穆宗初,宰相更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独得对,因请亟用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请之中,上然之。”^{[3]368}可见,在元稹升迁的途径中,段文昌是出了力的。李绅和元稹的私人关系则更为密切,他们早年共同发起新乐府的创作,均为新乐府运动的领军式人物,后来又同在翰林院,情同款密。通过上面分析,我们认为,裴度对元稹的不满,实则是对元和以来翰林学士院之间的“新仇”与“旧怨”的叠加起来的一次总爆发。

(二)裴度与元稹对待削藩的不同态度

藩镇割据是中晚唐政治中的一大痼疾。中晚唐时期藩镇的势力非常嚣张,他们完全不接受朝廷的管束,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处于独立状态,在权力交接上,或父死子代,或兄终弟及,俨然国中之国。藩镇割据的存在直接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完整性,不予以打击,势必影响中央的威信与尊严,甚至威胁王朝的存在。

但如何对待藩镇问题,朝廷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德宗初年,朝廷也曾对藩镇用兵。但由于藩镇势力过于嚣张,朝廷兵力财力有限,削藩受挫,德宗晚年不得已对藩镇采取了姑息态度,其结果只能是养痍遗患。宪宗即位后,在削藩问题上态度坚决,并在削藩的过程中出雄才大略。但削藩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连宪宗本人都一直面临着朝廷里各种势力的压力。元和十年高霞寓带领的官军淮西用兵时败绩,给削藩带来了很大阻力,主张姑息的大臣在朝堂上纷纷提出罢兵之说。宪宗力排众议,信任

主张削藩的裴度,罢免了主张罢兵的宰相和翰林学士,才终于换来了元和十二年的平定淮西的胜利。

纵观中唐历史上,皇帝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削藩的格局。例如,唐德宗晚年对藩镇采取姑息态度,藩镇的势力就比较嚣张,而唐宪宗对待削藩态度坚决,削藩就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削藩能否成功,起重要影响的还是皇帝本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穆宗可谓是长庆时期妥协派代表。他“在藩邸时,习见用兵之弊,以为戎臣武卒,法当姑息。”^{[2]1360}对此,《资治通鉴》也说“初,上在东宫,闻天下厌苦宪宗用兵,故即位,务优假将卒以求姑息。”^[8]正是唐穆宗的这种认识,导致了长庆朝廷对藩镇姑息态度的滋长,也导致了元和时反对削藩、主张罢兵的势力卷土重来。如元和时期任翰林学士的萧俛、令狐楚、段文昌、杜元颖等在穆宗朝都曾位居宰相,他们在削藩问题上依然保持了原来的态度。杜元颖、崔植、萧俛、段文昌等辈,大多平庸无能,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缺乏远见卓识。如萧俛、段文昌劝说穆宗“消兵”,“上之初即位也,两河略定,萧俛、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消兵’,意在迎合穆宗皇帝的心理。而杜元颖、崔植等又不知兵,在处理朱克融的问题上,不接受有经验的幽州节度使刘总的意见,不对朱克融采取安抚手段,而把不懂当地民情的张弘靖派到幽、蓟,触犯了军士的情绪,使朱克融从长安逃回幽州后,纠集当地军人背叛朝廷。王庭凑也趁机杀田弘正自代。朱克融、王庭凑叛乱后,经过消兵的官军战斗力大大下降,朝廷“诏征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招募,乌合之众。”^{[8]7808}朝廷集15万兵力,又有裴度、乌重胤、李光颜这样的名臣宿将,用了近两年时间,却对付不了仅万余人的叛军,最后迫不得已昭雪朱克融、王庭凑,并赐以节钺,致使朝廷失去了刚刚归附朝廷的河朔方镇,失去了举数年之功换来的削藩成果。其中杜元颖对待藩镇的态度最能说明妥协派对藩镇的姑息态度。如果说在杜元颖主张对待河朔采取安抚手段还可以理解为权宜之计,那么在徐州、汴州背叛朝廷问题上,杜元颖在一些根本原则问题一再让步,最能说明他在藩镇问题上的苟且心理。所以,连一向对藩镇倾向于姑息态度的李逢吉也看出了杜元颖主张的按河北旧例,授徐州、汴州叛将以节钺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李逢吉曰‘河

北之事,盖非获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则是江、淮以南皆非国家有也。”但“杜元颖、张叔平争之曰:‘奈何惜数尺之节,不爱一方百姓乎!’”^{[8]7819}杜元颖以百姓疾苦为借口,姑息叛军,实则是置朝廷大局于不顾。由此可见,妥协派在长庆朝廷里势力是何等猖獗。而裴度主张对藩镇用兵,遭到了来自宰相杜元颖为代表的群体妥协势力的反对。相比之下,元稹反对对藩镇用兵的态度根本算不上是最坚决的。况且,从元稹一贯态度上看,很难说他就是反对削藩的。最起码,他与杜元颖对藩镇的态度性质上有很大不同。关于他在翰林学士期间阻挠裴度对河北用兵之事,也许并不完全像正史中所说的那样,完全是想阻止裴度因战事成功而入相,更有可能是在衡量了朝廷的实力后,认为朝廷在用兵上困难较多,才主张昭雪王庭凑合朱克融的。因为“国家自宪宗诛除群盗,帑藏虚竭,穆宗即位,赏赐过当,及幽、镇共起,征发百端,财力殫竭。时诸镇兵十五万余,才出其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2]3886}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元稹的预料:朝廷用兵不但没有起到打击叛军的目的,反而陷入战争的泥潭。最后没办法只得昭雪叛军,使得朝廷既消耗了财力人力,又大大丢了面子。

在用兵的策略和方式上,元稹与裴度也存在着分歧。作为国家宿将和功臣,裴度希望以实力来解决问题,给叛军以沉重打击,这原是对的。问题出在他对这次平叛成功的高度自信上。在给穆宗的上书中,认为“河朔患小,禁闾患大。小者,臣等与诸戎臣必能剪灭;大者,非陛下制断,非陛下觉悟,无计驱除。”^{[2]4422}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裴度显然过高估计了穆宗的决断力和朝廷的实力,对战事的发展也做了错误的判断。当然,与裴度这样干练的政治家相比,元稹的用兵策略显然带有书生意气。他受到穆宗非次擢拔,也受到朝野的轻笑,“思立奇节报天子以厌人心”^{[4]5228},说白了,是想来以此堵堵大家的嘴,他用于方的计谋,买通兵部吏部,弄出了一些伪告身,想以此离间河北几个藩镇,从而以“智”取胜。本来,在战争中,想取得胜利,除了直接用兵之外,还有伐谋、伐交之说。作为当时的宰相,元稹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但伪造公文之举,又显示出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一面。这一轻率的举动,终于成为李逢吉及其

党羽攻击他的口实。

元稹与裴度在对藩镇用兵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很难说谁对谁错。战争是把双刃剑,可以打击敌人,也会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选择最佳时机,采用最佳策略,是取胜的法宝。史书过分强调元稹为了个人利益阻止裴度用兵,不够客观。而裴度本人也在此问题上大肆攻击元稹,也决非冷静。

(三)皇帝对相权的侵夺造成的政治家与文士之间的矛盾

元稹的升迁过程反映了皇帝侵夺相权,由此造成的翰林学士与宰相之间关系的紧张是实际情况。中唐翰林学士的出现,本就是皇帝分割相权以扩大个人权利的行为。按照惯例,新宰相任命须由前任宰相推荐提名。但穆宗往往破坏这种用人机制,火速提拔“人才”。他看重的人,甚至有在一年内从一个普通的从七品官荣升为宰相的,如杜元颖“自穆宗登极,自补阙至侍郎,不周岁居辅相之地。辞臣速达,未有如元颖之比也。”^{[2]4264}。穆宗提拔元稹为宰相也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其他如萧俛、杜元颖、段文昌等差不多都是如此。总的看来,长庆期间的宰相任命,有很大随意性,任期也非常短,有的在任只不过几个月时间。(只有李逢吉一人任期稍长,此人还是心计阴险的老政客,在位期间不断玩弄权术,排挤打压异己。)裴度、元稹的交恶以致矛盾激化,反映了穆宗的政治素质幼稚,反映了他喜欢加强自己权利的行为(这也成为长庆政坛的高度不稳定状态的重要原因)。由于翰林学士多由“一代文彦”担任,穆宗本人又好文,不但任用元稹做翰林学士,对他也格外信任:“上怜之,三召与语。语及兵赋泊西北边,因命经纪之。是后书奏及进见,皆天下事。外间不知,多臆度。”^{[3]368}相反,一些富有执政经验老成持重的大臣如裴度等则被排挤出朝廷。穆宗这样的行为很容易在资深政治家和文士之间的引起矛盾。裴度与元稹的矛盾也是由穆宗用人不当造成的。裴度出将入相,完全凭借个人实力。元稹的仕途与他的文学才能是联系在一起,是皇帝个人偏好所致。(但皇帝的偏好并不能提高元稹这样的文士的政治素质。)像裴度这样靠个人能力取得政治地位元勋看不起靠舞弄文墨起家的政治暴发户,自然是情理之中的。裴度与元稹的矛盾也反映了中唐时期以裴度为代表的

用实际政治经验、政治手腕和谋略的务实派与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政治理想主义的士林之间的矛盾。

三、裴、元交恶与长庆政坛和文坛

史学研究一般认为,大和九年的甘露之变,是唐王朝江河日下的政治转折点,也是中唐和晚唐政治和文学的分水岭。实际上,从某些角度看,唐穆宗在位的长庆四年时间,才是唐王朝政治和文学的分水岭。其中,裴度与元稹交恶就传达出一个明显的政治信号——唐王朝中兴之梦的幻灭。穆宗即位后在用人、用兵方面的一系列措施,都显示了他并未能将宪宗辛辛苦苦换来的国家统一维持下去。裴度与元稹交恶也成为唐代文坛的一个转折点。经历了长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元稹终于被排挤出朝廷,两年之后,穆宗为宦官杀害,元稹返朝的政治希望幻灭。此后在越州刺史和浙西观察使任上,与白居易唱和,吟风嘲月、追逐声色,不再砥砺名节,甚至有了关于他“渎货”(受贿)的传闻。白居易则有了“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的“吏隐”生活^[9]。如果说元白二人的生活还有他们个人命运的偶然性,那么看

看其他文人的经历,就可以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必然的。钱徽在长庆元年的科考案被逐出朝廷,令狐楚则因为在充当宪宗山陵使时经济问题,一再被贬;李绅被李逢吉排挤出朝廷,差点丢了性命;而长庆四年文坛一代巨匠韩愈的去世,似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为元和时期文坛繁花似锦的局面画上了一个句号。几年之后,当裴度也开始明哲保身,退居东都洛阳,大兴土木,修建绿野堂,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唱和,说明唐王朝的命运已经是江河日下,无可救药了。

参考文献:

- [1] 周相录. 元稹年谱新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2] 刘昉. 旧唐书·裴度传:卷一百七十[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冀勤,点校. 元稹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4]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元稹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 俞鹿年.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隋唐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7.
- [6] 董浩. 全唐文:537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417.
- [7] 毛蕾. 唐代翰林学士[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00-201.
- [8]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5.
- [9] 朱金城. 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330.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Pei Du and Yuan Zhen upon the Literature in Mid-Tang Dynasty

DU Xuexia

(Research Centre of Central Plain Cultures,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worse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i Du and Yuan Zhen, two distinguished poets, was a political event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Mid-Tang Dynasty. It was a transforming procedure that their relationship began from a relative good term to worsening and finally unconcealed long-lasting antagonism. The antagonism was actually an interlacing point of the intricate contradictions of the Mid-Tang Dynasty. With the personal grudge as the beginning, the disparity of their political ideas,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they belonged to, was in fact the basic reason of their antagonism. Of all the contradictions, the focus was those between the different *Hanlin* academic scholar groups represented separately by Pei and Yuan, between Pei and his men's proposition of diminishing the power of military leaders and the inclination of compromising by the Royal Emperor and his "men of compromise", and between Pei, the senior politician, and the literary men represented by Yuan.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antagonism had great impact on the cultural trend of Mid-Tang Dynasty.

Key words: personal grudge; *Hanlin* academic scholar; diminishing the power of military leaders; senior politician; literary men

〔责任编辑:都媛〕